

奉使朝鲜事迹考释》(《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大历史系,1996年6月)等文。海寿在《明太宗实录》中仅出现两次,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朱棣在漠北暴崩,偕学士杨荣驰报北京的就是他。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明朝史籍中只留下雪中鸿爪般的印迹,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却不少。另外一个黄俨,地位更高,他是朱棣在燕府潜邸的亲近内侍,构衅于朱氏父子之间,几乎动摇仁宗的太子地位。永乐时期,曾多次奉使朝鲜,替朱棣行征求“处女”等密事。但《明太宗实录》仅记永乐七年九月的一次出使,余尽湮没。读《李朝实录》这个明朝最早的权阉,面目登时清晰;明初一些为史籍所隐讳的政情与真相也跃然纸上。

新史料不仅产生新的议题,也带来新的——比如说社会史——研究领域。北京西山黑山会有个刚铁祠,祭祀明初宦官“刚祖”,祠内有关碑刻,跨明清直至民国,达23通之多。但“刚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梁绍杰最早注意到这个人物,写了《钢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谜》(《大陆杂志》91卷5期,1995年)。其后赵世瑜、张宏艳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写了《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指出那位为明清两代宦官所崇祀,食了六百年香火的“太监祖师爷”,其实是宦官们自己创造,并不断敷衍附会的;阉人们那婉曲而微妙的精神世界,正藏在那表面看来千篇一律的祭祀文字里。如果没有对这些材料的精心发掘,那个“世界”也便永远消失了。

宦官史料利用不足,既有“自觉”(如以“特务”来概括明代宦官史,则异此的史料往往不取),或“非自觉”(泥于旧套,视野不开)的主观原因;也有史料本身匮乏,又散漫于典籍,非下大力气钩稽,无能奏网罗之功的客观原因。但它确实已经对明代宦官,乃至明史的研究造成“堵塞”。因此我们说:明代宦官研究,与明史研究的其它任何一个领域相比,都更需要首先解决史料的问题。而欲有所突破,提升研究水平、拓宽研究路径,必须以发掘、整理史料为首务,这样才能为研究带来一个真正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繁荣。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1. 科举“策问”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共有7篇论文,从科举学、思想史等不同视角,探析“策问”研究的学术价值,丰富了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刘海峰的《“策学”与科举学》探讨了“策学”的起源及其涵义变迁,深入考察唐至清代“策学”发展的特点、“策学”著作类型,分析“策

学”与科举学研究的关系。认为“策学”作为应对科举策问的专门之学,内容极为丰富;“策学”文献是科举试卷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三浦秀一的《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总结、探讨明代“性学策”发展三阶段的特点:尊重编纂本、尊重原作及尊重自得或异说,在此基础上,解析“性学策”发展与明代思想史的关联性,认为探究策问与程策在思想上扮演的角色,是动态掌握明代思想史整体的重要环节。吴国武考察宋初以降科举试策的沿革及其学术导向,指出试策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在诸多方面成为真、仁之际经学新变的重要推力。

此外,一些学者从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的视角探讨策问的功能与影响。王炳照以清代状元策为考察中心,从答卷书写格式、用词避讳、书体演变等方面,阐释了科举考试的社会教化功能。金滢坤梳理了唐代试策的主要结构和要素,分析了唐代试策文体的时代区别和发展变化。日本学者熊本崇通过对绍兴二十一年周必大的省试对策与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的殿试对策进行比较,指出政治动向对举子对策内容有明显的影响。水上雅晴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清代考官重视策问的实际状态,阐明乾嘉时期汉学家官员辈出的原因在于,汉学家官员主要根据对策的质量发掘人才,推动其自身的“再生产”。

2 科举社会研究。相关论文 4 篇,除台湾地区学者李弘祺的《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其余 3 篇为日本学者所作,这也反映了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科举社会史研究的重视。

李弘祺着重考察、分析了科举考试对两宋宗族组织演变的历史影响。指出,随着宋代科举入仕重要性的兴起,中古以郡望为基础的宗族观念逐渐被地方性大家族或宗族所取代;宋代科举实行地方解额的方法,使家族结构不只要考虑血缘关系,也要注重地缘因素,宋代家族组织遂带有浓厚的地缘色彩。这种转变冲击了五世而终的观念,大家族的力量依靠道学家的支持,变成了中国后代家族组织的常态。

近藤一成《明州·庆元府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丰氏为个案:从丰稷到丰坊》利用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所载丰氏家族史料,考察南宋宁波四大姓氏之一——丰氏后裔丰坊的家族谱系、衰落原因,贯通宋、元、明三代,从一个侧面具体揭示了明代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樱井智美考察元代庆元科举合格者及其科举意识,论析当地士人社会与科举的关系。饭山知保考察了金代地方士人对科举与学校制度改革反应,探析科举考试对金朝统治下的社会统合作用。这些研究加深了对科举考试社会功能的认识。

3 科举制度研究。相关论文 5 篇,探讨范围广、见解深刻。张希清的论文《“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唐宋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详细考察了唐宋四百多年间科举选拔标准的嬗变过程,揭示从采“公荐”、纳“公卷”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其重大影响与现实借鉴意义。何忠礼的《南宋武举论略》在考察两宋武举沿革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南宋加强武举的举措、考试、等第、授官状况及地位、影响,认为南宋武举功用不彰的原因,最主要是重文抑武的国策,其次是武举自身存在的弊端及武举进士沾上“文气”的消极影响。

李世愉的《“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通过考察、分析此条科场禁令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结合嘉庆朝以后的十二起案例以及乡会试考试内容、缮卷条规改革的

三项事例,论证了“不准临场条奏”对于清代维护科场稳定和人才选拔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规定,反映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和清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鹤成久章的《明代会试判卷标准考》通过对《会试录》所收《程文》作者名次及所附考官“批语”的分析,印证了明代会试判卷重视初场的结论。此外,韩国学者裴淑姬论述了宋代科举对高丽士人的录用及其历史影响。

4 科举文化研究。科举文化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热点问题,相关论文共8篇,探讨了科举公平理念、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关系、科举礼仪、科举“官年”现象等内容,提出不少新见解。

台湾大学甘怀真论析科举制与社会公平观念的关系,认为明清科举制度的特色为“外部评鉴”、“客观量化”,科举作为东亚重要的文化遗产,仍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对于公平概念的认识。张亚群探讨了科举考试的汉字文化特征,揭示科举制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三方面影响,并从汉字文化的角度,解析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渡边健哉考证了元代进士及第唱名和谢恩等礼仪与宋代科举礼仪的差异,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蕴。大野晃嗣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例证,考察和分析明清科举中的“官年”现象;认为这类“官年”,可与学校制度以及连续上升的考试制度一起称之为明清时代的“考试文化”,广泛存在于士人群体中。

科举文化探讨还包括阳明学与科举考试关系、科举文学之个案研究。张学智通过典型人物及事例,探讨了阳明学对明代中后期制义、士风的深刻影响。钱明考察了王阳明对科举的态度、科场教育活动,认为作为正统、主流、体制之化身的科举文化,王阳明更多地是持批判校正的态度,是想通过体制内的改良方式,完善和人化(或谓心学化)科举制度;没有科举文化这个平台,阳明学的兴起是难以实现的。日本学者金元泰介以经世思想家陈子龙的八股文为例证,考察、分析明末几社评选八股文的朱学批判导向与影响。此外,加部勇一郎通过对小说《镜花缘》中“女试”作细节考察,揭示作者李汝珍的科举意识,反映了清代乾嘉时期士人的一般心态。

5 科举与教育关系研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依存互动,至明代形成了完整的科举教育体系。毛佩琦在《明代的国子监祭酒》论文报告中,论析了国子监祭酒的职能、选任标准、出路及其政治影响,指出统治者整顿官学、禁书院,是与当时社会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在短暂的“中兴”之后,很快陷入危机之中。邓洪波的《明代书院的科举之会与科举之学》辨析教学之会与科举之会的含义,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考察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及相互影响,认为科举之会具有多种文化取向。宋方青的《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考察传统科举的政法考试性质,从清末科举变革中的法律试题、废科举后法政学堂的发展两方面,论证了科举革废对清末法政教育转型的重大影响。

6 科举评价及科举文献考证。科举考试利弊并存,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和科举社会影响的扩大,程式化的八股取士弊端日益受到士人的抨击。郑吉雄根据章学诚的佚文《与史氏诸表侄论策对书》考察其对科举策问的亲身体验,结合《文史通义》关于官师合一、治教不分、治学切于人伦日用、圣学不离典章政教等经世思想言论,揭示其对八股文的批判。徐兴庆运用朱舜水与日本德川初期官学界人物的往来书简等新史料,考察其个人、家族的科举经历,分析其对明末八股取士、不务实学等弊端的批判。

在科举文献考证方面,龚延明的《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认为,《皇宋十朝纲要》将进士与贡士一并收入进士目下不妥,混淆了进士与贡士、进士试与贡士试的概念。李占

伦的《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岁、科考试文牍发微》利用新发现的同治年间 68 件闽省汀州府和长汀县科举考试的官书文件,探讨清代岁试、科试的具体情况,颇具史料价值。

总之,科举作为古代中国和东亚盛行 1300 多年的选官制度与考试活动,已积淀为一份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科举学研究的对象,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大会发言以汉语为主,使与会者在文化上倍感亲切。正如刘海峰教授在大会致词所言:“科举学者,今日东亚学术之新潮流也。”这次科举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拓展和深化科举研究的学术领域,也有力地促进了科举学研究的国际化。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张亚群)

“元上都与元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元上都与元代社会”学术研讨会。本次大会在元上都所在地——内蒙古正蓝旗召开。来自美国、韩国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 80 余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 46 篇。与会代表围绕元上都的宫廷生活与文化、元上都和元大都的关系、不同族别和国别文人对上都的描写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交流。本次会议的研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元上都的宫廷生活与文化。杨晓春《略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之元上都》认为,上都是一座以汉地制度建设在草原上的都城,多处取法于中古之后中国都城的主流制度,但也具有与营建和变迁的特殊条件有关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蒙古因素。吴志坚《元上都——一座具有城市外形的草原斡耳朵》认为,上都城可以说是整个斡耳朵群落的城市化,斡耳朵原则适用范围的变化是元代城市发展逻辑的重要线索。杨印民《滦河美酒斗十千——元上都的宫廷饮食与街市酒业》研究了清暑期间的上都宫廷宴饮和街市酒业情况。那顺乌力吉《从元朝汗廷祭祀看元上都的历史地位》认为,蒙古汗廷祭祀在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蒙古国时期的四时祭祀从岭北草原都城转到元上都并逐渐规范,后来随着蒙古汗廷的北迁再次迁回漠北,这一演变过程中元上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自 17 世纪末以来,英、俄、法等国的众多学者陆续对元上都进行考察,留下了关于宫城建设和忽必烈巡幸的考察报告,李中会《清季民国时期西洋旅行者在元上都》对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整理。〔美〕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刘元珠通过对许有壬《至正集》等相关记载的考察,认为在上都附近发现的祭祀石像之一为燕铁木儿。孟繁清、杨淑红《元上都留守颜伯祥及其家人史事考》结合与蒙元皇室关系密切的颜氏家族中颜伯祥、颜天翼、颜哈班史事考证,解释了元代的民族融合情况。魏静《泰定初年扈从上都经筵官虞集之官职考释》探讨虞集在泰定年间兼职经筵的身份及其在经筵中从事的具体事务。以至元十三年张宗演入觐和次年张留孙受青睐为契机,龙虎山正一道不断派遣道士前往两都活动,并最终获得了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权力,吴小红《元代